

· 医学史研究 ·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中医药文化

张颖¹ 陈星园²

摘要 《马可波罗行纪》是早期西方汉学的代表作,它虽非一部药物专著,但也记载了一些与中医药相关的内容,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医药的认识水平。本文主要对《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中医药内容进行梳理与论述,探讨该书中关于中医药文化记载的特点及其原因,并由此总结出早期中医西传的概况与特色。

关键词 《马可波罗行纪》;游记汉学;中医药;中医西传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avels of Mrco Polo* ZHANG Ying¹ and CHEN Xing-yuan² 1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300073); 2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100083)

ABSTRACT As one of leading books on Western sinology in the early times,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covers certain events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hich reflects the knowledge of western people about TCM at that time, though it is not a treatise on pharmacy.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CM events contained in this travel book, to discuss the features of the how and why TCM culture are documented and to summarize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medicine spreading in West.

KEYWORDS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velers' sin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in West

《马可波罗行纪》是由世界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口述,作家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撰写的中世纪西方游记文学的代表作。在这本著作中,涵括了当时以中国为主的东方世界的各色见闻,它“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激发了欧洲人的世俗观念,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1]。自《马可波罗行纪》问世以后,对其的研究一直从未中断,然而历观各家研究,关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中医药文化的总结、整理与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主要从《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的中药材及功用,中医医生的基本状况,医疗卫生防疫措施,养生保健方法 4 个方面加以研究,继而对书中医药知识的记载特点与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当时中医西传的特点进行总结。

1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中药材

由于马可波罗“在中国 17 年的大部分时间,大约都是来往各地民间,并且由于经商的需要而深入到社会基层”^[2]。所以在《马可波罗行纪》中,马可波罗每到一地都会介绍到当地的特色物产,在整本书中,总共提到了姜、茶、胡椒、大黄、麝香、肉桂、豆蔻、丁香、蛇胆等多味中药材。通过阅读书中的记载,欧洲人可以初步了解到许多中药基础知识。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一般对药材的记载往往是寥寥几行,但是对麝香和蛇胆两味药材的记载篇幅则较详实。马可波罗记载道:“(凉州)此地有世界最良之麝香。请言其出产之法如下:此地有一种野兽,形如羚羊,蹄尾类羚羊,毛类鹿而较粗,头无角,口有四牙,上下各二,长三指,薄而不厚,上牙下垂,下牙上峙。兽形甚美,取麝之法如下:捕得此兽以后,割其脐下之血袋。袋处皮肉之间,连皮割下,其中之血即是麝香。”^[3]从描述中可以获知两点信息:(1)马可波罗行至的凉州是麝香的出产地;(2)马可波罗记载了麝香的具体猎取方法,为后人获取麝香指明了方向。古凉州即是今甘肃省武威市,此地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然资源丰富,自古盛产麝香,马可波罗的记载符合实

基金项目:天津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No. 2013JYB006)

作者单位:1.天津中医药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3);2.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汉语学院(北京 100083)

通讯作者:陈星园, Tel:010-59596582, E-mail:15222873262@139.com

DOI: 10.7661/j.cjim.20170517.090

情。此外,麝香为雄麝的肚脐和生殖器之间的腺囊的分泌物,今人猎麝取香的方法是将腺囊连皮割下,将毛剪短,阴干,马可波罗所记载的“连皮割下脐下之血袋”的方法与此大致相符。纵观《马可波罗行纪》全书,其中关于中医药的记载大都非常零散、细碎,但是关于麝香这一味药的记载却相对详细,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西方人将麝香当作一种珍贵的香料,因产量稀少而价格昂贵,作为商人的马可波罗当然将其视为瑰宝。但也正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尚未认识到麝香的药物价值,所以马可波罗在记载中缺少一种将其作为中药刻意记载下来的意识,故无对麝香的药性、功能等进行描述。

然而对于蛇胆这一味中药,除了捕猎方法,马可波罗还写道:“盖此为一种极宝贵之药品,设有为疯狗所啮者,用此胆些许,量如一小钱重,饮之立愈。设有妇女难产者,以相当量治之,胎儿立下。此外凡有疾如癣疥或其他恶疾者,若以此胆些许治之,在一最短时间内,必可痊愈;所以其售价甚贵。”^[3]这里对于蛇胆的药效和使用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甚至精确到了大致的剂量,实属难得。蛇胆,在我国较早就记载入药,最先见于汉朝的《名医别录》,其中记载腹蛇胆“味苦,微寒,有毒,主治疮”^[4],蝮蛇胆“味甘、苦,寒,有小毒,主治心腹痛,下部疮,目肿痛”^[4]。由此可以印证马可波罗所说蛇胆可以治愈“有疾如癣疥或其他恶疾者”的正确性。但是马可波罗认为蛇胆可以治疗妇人难产,这与《名医别录》中记载蝮蛇胆可以“治风毒,妇人产后腹痛余疾。”^[4]的说法有出入。另外,马可波罗记载蛇胆可以治疗疯狗咬伤,而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学巨著《本草纲目》中的记载则是“狂犬啮人:蛇脯为末,水服五分,日三服。”^[5]导致这些记载不相一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整体而言,《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中医药的记载基本属实,它为人们如何使用此种药物提供了指导,其药学价值应该得到认可。

2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中医医生

除中医药材之外,《马可波罗行纪》对当时中国的医生也有描写,不论是在帝王或者是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医生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社会地位很高。

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时,恰逢元代,而元代最高的医官品位则达到秦汉以来历史上的最高点,始终在正四品以上,最高时达到正二品,地位显赫^[6]。《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道,不仅在狩猎的时候,“盖其地有医师,星者,打捕鹰人,及其他有裨于此周密人口之营业。”^[3],而且是像在元旦这样重大的日子里,“节庆之

日黎明……一切国王蕃主,一切公侯伯男骑尉,一切星者哲人医师打捕鹰人,以及附近诸地之其他不少官吏,皆至大殿朝贺君主。”^[3]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吴越之地历代名医辈出,享誉四方,从周代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就有千余家,特别是在元代,更是名医荟萃,此时的著名医学家朱丹溪便是浙江义乌人,与其齐名的名医葛乾孙则是江苏苏州人。而吴门医派在此时也已建立,其下名医不胜枚举。马可波罗行至苏杭时写道:“(苏州)此城有文人医师甚众”^[3]可见此言不虚。而另一方面,马可波罗写道:“(杭州)其他街道居有医士星者。”^[3]据考证,当时在杭州的一些街道上,住着医师和星占学家,他们向人传授文化和许多其他的技术。例如杭州蒋景便是如此:“杭之业于药者千百不啻,莫敢与之齿也,凡学于君者多良医,而食于君者皆良工云。”^[7]由此可见民间医学发展的盛景。

3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保健养生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还零散的有一些关于当时人保健养生方面的记录。中国一些地方特产药酒,例如“契丹地方之人大多数饮一种如下所述之酒:彼等酿造米酒,置不少好香料于其中。其味之佳,非其他诸酒所可及。盖其不仅味佳,而且色清爽目。其味极浓,较其他酒为易醉。”^[3]据考证,当时人们将香料与药材入酒,制成药酒。药酒素有“百酒之长”的美称,契丹人将强身健体的中药与酒融于一体,酒可以使中药的有效成分易溶于其中,从而提高疗效。元代太医忽思慧在其所著的《饮膳正要》中,就从食疗角度记录了诸如鹿角酒、虎骨酒、枸杞酒、地黄酒、茯苓酒等 10 余首具有较好滋补作用的药酒方^[8]。由此可见此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注重保健养生,并融于日常的生活当中。

除此之外,《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永昌)此地之人皆用金饰齿;别言之,每人齿上用金作套,如齿形,套于齿上,上下齿皆然。”^[3]这种用金子做的牙套除装饰的作用之外,金片也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可见元代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爱牙护齿。

4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卫生防疫

除上述记载外,《马可波罗行纪》中不乏关于当时卫生防疫内容的记载。比如说在大汗举行大朝宴时,“大汗所坐殿内,有一处置一精金大瓮,大瓮之四角,各列一小瓮,满盛精贵之香料。注大瓮之酒于小瓮,然后用精金大杓取酒……取酒后,以此大杓连带柄之金盞二,置于两人间,使各人得用于杓中取酒。”^[3]由此可知分酒时,需使用专用的器具,首先将酒从大瓮注入小瓮,再由小瓮取至大杓,最后用每位宾客用各自的

金盞将酒从大杓取出,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共用器具而引起的交叉感染。除此之外,“献饮食于大汗之人,有大臣数人,皆用金绢巾蒙其口鼻,俾其气息不触大汗饮食之物。”^[3]将金绢巾蒙其口鼻可以避免侍者的气息和唾液与大汗的饮食接触,这与现在的口罩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当时的人们非常注重饮食卫生与防疫。

不仅是在当时的上层社会注意卫生,《马可波罗行纪》中还记载了当时民间的停尸方法:“先制一匣,匣壁厚有一掌。接合甚密。施以绘画。置樟脑香料不少于匣中,以避臭气。”^[3]可见此时平民已懂得用樟脑和香料保存尸体,这是因为古代的卫生条件与医疗水平较差,所以百姓也格外注意卫生防疫措施。

5 《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中医文化记载的特点及其原因

从以上材料的整理可以看出《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中医药的记载有以下几个特点:(1)有关中药材名称的记载篇幅居多,但只是单纯的零散的罗列,未对药性和药用价值做过多的说明与解释。(2)在对医生的描写中,侧面凸显出了医生在当时中国的重要地位,但都没有列出具体姓名与著名案例,实属一大遗憾。(3)中医药文化渗透在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卫生防疫到丧葬制度再到人们的饮食保健,说明中医已经深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的生活习惯融为一体。(4)除了描写中药、名医等情况之外,对中医的特色的诊法、治法无具体描述,对中医思想也未太多的认识,对中医药的认识还很粗浅。

细究这些特点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从时代大背景看,马可波罗生活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时期,此时欧洲的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苦,对医药方面的认识自然也相当匮乏,所以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游历过程中对医药文化的记载也相应的十分稀少。而且在马可波罗来华之前,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还处于在想象多于现实的阶段,“随着罗马人的东征和不久之后蒙古人的铁骑向西挺进,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才终于从神话走向现实,《马可波罗行纪》是当时最典型的代表,它奠基了早期的西方‘游记汉学’”。^[1]正是因为马可波罗生活于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决定了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他难以用理性的态度去科学细致地描述在中国的见闻,最终导致他对中医学的认识也是浮于表面的。即“由于作者过分注重于自身的神奇经历和异乡趣闻的猎奇描写因而缺乏研究中国的自觉意识。”^[9]第二,马可波罗是出生在一个商人世家,作为一介商人,他所关心的当然是器物文化方面的

见闻,所以他较多描写的是中国的物产分布与商业情况。他之所以会记载某一见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比如上文说到马可波罗运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载蛇胆这一中药,即是因为“其售价甚贵”。而相较于波兰汉学家卜弥格(Michel Boym),这位曾在故乡担任过王室御医,对医药学颇有研究,来华后以深厚的西学理论来探讨中国的传统医学并著有专著的汉学家来说,马可波罗自然对医药方面的论述较少且认识不深了。

综上所述,虽然马可波罗受时代与个人原因所限,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对中医药的介绍较为稀少且不成系统,“作品停留在对中国表面的报道上,尚不能深入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10]但是却从侧面为西方传递了早期的中医药文化,塑造了最早的中医药文化形象。同时,通过对中医药的认识也有利于西方人更为深层次地、全方位地思考中国、认识中国。而《马可波罗行纪》作为中世纪西方人认识东方的巅峰,其中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自然也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由此不难知道早期的中医西传也同样呈现出起步阶段的特点,即认识处于启蒙层面,直观且并不系统,缺乏将其当作一门正式学科研究的意思。

参 考 文 献

- [1] 张西平. 西方汉学十五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30, 47.
- [2] 蔡美彪. 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J]. 中国社会科学, 1992, 2: 186 - 187.
- [3] 法·沙海昂. 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纪[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10, 148, 197 - 198, 202 - 203, 212, 230, 263, 316, 325.
- [4] 魏晋·陶弘景. 名医别录[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287.
- [5] 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中册)[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1596.
- [6] 元·许有壬. 至正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卷四四, 大都三皇庙碑.
- [7] 元·黄潜. 金华黄先生文集[M]. 四部丛刊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卷三八, 养斋蒋君墓志铭.
- [8] 元·忽思慧. 饮膳正要[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
- [9] 钱林森. 论游记在西方汉学中的地位和作用[J]. 江苏社会科学, 2000, 6: 157.
- [10] 张西平主编. 东西流水终相逢[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0: 74.

(收稿:2014-08-17 修回:2017-05-15)

责任编辑:汤 静